

门口的大婶把一件红色透明短纱裙穿到模特身上,胖乎乎的手指头拽了拽飘起的裙角,又捏起V领的两个边微微往起提。摆弄好了,她从蓝白点的围裙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模特拍了张照片发给了老板。

这是一家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小巷子里的内衣制衣厂。工位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丁字裤,一抬眼就看到穿着三点式、护士服、红肚兜的塑料模特。

在灌云县的伊山镇和东王集镇,无论是随手打车遇到的出租车司机,还是路边种菜的大娘,他们都骄傲地说,“我家媳妇就是做这个的”。酒店的保洁阿姨羡慕已入行的姐妹,“我是不会做,要是会我也去做啦”。

1 “情趣的搬运工”

三月的苏北,制衣女工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厚棉衣,用一针一线缝制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情趣内衣。这些衣服将出现在世界各地。

灌云是个人口100万的苏北小县,距离连云港市区约40公里。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回乡的打工者把县城挤满。

节后,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门口纷纷贴起火红的招工告示——某某内衣服装厂招收缝纫工,工资4000-6000元左右,每月15号结账。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就靠情趣内衣。”整个下午,冬妮弓着背坐在缝纫机前,头半缩在鲜红的袄子里,只露出侧脸。若不是梳在脑后的头发留下挑染过又褪色的痕迹,看不出来她33岁的年纪。她把丝带捏成一个蝴蝶结的样子,匝在黑色低领半透明内衣的胸口,5秒钟一个,除了两只手不停地忙活,身子一动不动。这个姿势,她已经保持了3个小时。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绝不是一句空话。丁字裤包三个边1毛钱,耽误20秒就少挣1毛。她手里这件新款内衣,手工费1块8一件,一天做100件。卖出去的批发价大约8块,网店挂出的零售价大约28块。如果卖到美国,仅批发价就有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块钱。

冬妮终于站起来,抓起一把工作台上刚做好的黑色透明蕾丝内衣,塞进草绿色的麻袋,递给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每天来这里拿些内衣回家剪线头。对面仓库里,靠近楼梯口的四排货架已经空了。冬妮的老板雷从瑞说,订单已经接到今年8月份,据他介绍,灌云县30岁至45岁的人一共有大约10万人,女性占一半,而做情趣内衣的女工就有2万。

一件情趣内衣先由设计师画样式图,通过电子邮件和老板确认后发给大裁缝。大裁缝按照图片缝制样衣,再派给冬妮她们,照样衣复制。蕾丝、网纱、白布条、黑丝带这些材料,由裁剪工根据制版师的尺寸剪好,被冬妮们拼接成网上的“爆款”。

冬妮她们被当地人称为“机工”,不负责设计和剪裁,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缝纫机上操作。一个机工说,“我们不生产内衣,我们只是情趣的搬运工。”

“对你们来说,这是性感什么的,”冬妮说,“但我们只看包几个边,匝几道工序,然后算工钱,没人喜欢新款。”她们对新款的衣服结构不熟悉,比老款做起来慢。她手里这件1块8的,一天如果少做20件,就少赚36块。

离“风情”最近的女工

这些平素最不解“风情”的女人们,却变成一群离“风情”最近的人。她们把平淡的生活织进针线,做出的情趣内衣就像曾经纳过的鞋底子、做过的眼罩、栽过的稻秧,和情欲毫无关系。



在制衣厂工作的女工们

2 “我们这里是生产的源头”

伊山镇的一家制衣厂是由菜市场后面的一块空地改造而成,绿色的塑料大棚取代了屋顶。新的工厂想开在城里已经没了地方,后入行的人只能把加工厂开在乡下,雇农村妇女一边带孩子,一边缝纫。在灌云,大大小小的工厂不下七八十家,但能自主开发设计能力的工厂不超过5家。低端为主、利润低、批发走量是主要的经营模式。

“接的订单越多越赚钱,只要工人能做出来,货供得上,就能赚钱。”雷从瑞说,“我们这里是生产的源头”。他厂房最靠里的几排货架编号以8开头,表示2008年。那是他们自主生产的第一批货,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他,成了镇上第一个开网店卖情趣内衣的人。

第一批情趣内衣从广东进货,放在店铺里和暖宝宝一起卖。慢慢地,雷从瑞和母亲萌生了想法——“买别人的还不如自己做,这东西总共没几块料子,一块布穿几根绳子,能有多难?”

客户要什么款式就做什么,看网上哪个好就“借鉴一下”。作为一个和服装设计

完全不沾边儿的门外汉,想做哪个款式就照猫画虎地剪,然后往自己身上套,尺寸合适就让工人做。

“那会儿供不应求,多丑也能成爆款。国外越露越容易爆,国内越含蓄越容易爆。”从去年开始,1991年出生的雷从瑞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生产模式,也有些担心被更加年轻化和个性化的店家超越。雷从瑞现在每天关注年轻人的网站,也加入了一些95后、00后的QQ群,最初只是想知道十年后的用户现在喜欢什么,“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在购买了。”学生一放假销量就下来,一开学就猛增,已经成为各家工厂老板的共识。

一年前,他在贴吧里看到一个学生喜欢的店,现在已经从皇冠做到了金冠,主要推荐的是“二次元的款式”。

这个91年的“老年人”在群里很不受欢迎,只因为说了一句“顶”,就暴露了“非二次元老年人”的身份,只好默默潜水不敢吱声。“不过,也是杞人忧天了。”他现在最迫切的希望是招工,完成订单。至于收入,“一年下来七位数吧。”

3 “谁穿的?反正我们不穿”

尽管这些女工们拥有足以骄傲的生产业绩,但是对“衣服做给谁穿”、“自己会不会穿”的问题却格外警惕。

70岁的大娘坐在圆板凳上给衣服剪线头,听到这个问题扭过头去,和其他女工讲起了家乡话,似乎以“听不懂”来遮掩羞涩。她伸长胳膊把衣服往远处拿,眯起眼睛盯了几秒又拿回眼前,空剪了两下,袖口的白线头还是没有掉下来。她住在七八里外的农村,除了麦收时忙一季,一年到头没有别的事情做,来厂里动动剪刀,一个月能赚将近2000块。

“谁穿的?反正我们不穿。”旁边粉衣服的大姐凑上来,拿着手里刚做好的镶白边的透明三角裤,“我送你一条,你敢要吗?”她和刘云,两个40岁人的笑声脆生生地搅在一起,她们自称“过来人”,也就是已婚。

刘云从服装厂出来做情趣内衣已经七八年了。花袖套磨得掉色了,她2秒钟就把细线穿进针孔,右手食指反复游走于缝纫机的针尖周围。偶尔,她也会被针扎到,血一下子涌出来。“本来机器上有个防止扎手的保护圈,我们为了赶工嫌碍事,一般都摘掉。”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赶着去买这些衣服。

“打个比方,有人拿刀杀了人,你不能说让铁匠不打刀。”一位年轻的作坊老板这样解释他们的生意。这也成为了小镇人的共识,“她穿她的,我做我的”。

高秋霞是嫁到灌云来的外乡人,三年前和老公开了个自己的网店。

一开始卖情趣内衣,她很不适应。第一次有人问她穿哪款老公会喜欢,她觉得“这个人好变态”。后来,她发现确实有人很认真地在问,“肚子上赘肉多不希望老公看见选哪款”、“胸小怎么办”,才知道普通人也会买这样的衣服,而且有男的买给



刘云正在缝纫机前赶工

老婆或女友,让她附上软绵绵的情话。

一天下午,裁剪师傅没来,她和老公决定自己动手做衣服。

“2,4,6...齐了,这是一套。”高秋霞的老公小声嘟囔着。四五米长的黑色蕾丝布料在桌面上铺开,他按高秋霞剪好的纸板模型在布料上画起弧度。他手腕上的足金链子是高秋霞买给他的,“抬胳膊都累得慌,没办法,媳妇买的不敢不戴。”

高秋霞个子很高,热情爱笑,面对老公时却“像个泼妇”。她的小店名字是老公起的,是她的真名。

不过,她自己的父母现在依然不知道她在做情趣内衣。“你的衣服有没有我们能穿的啊?”她只好搪塞,“没有没有。”出了灌云,这个职业还是让高秋霞说不出口。买她衣服的中国人,更多集中在北上广深。

和灌云人“不知道”、“没穿过”、“你问她”的回答不同,在北京上班的花花小金刚(网名)并不羞于谈论。她是一家导购网站情趣内衣的资深小编,夏天总是穿着吊带,“我卖情趣内衣的,整天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卖得出去么?”她直言,除了卖,她也会穿,会给自己买些精致的。

记者走访期间,只有一个女工承认自己穿过自己做的情趣内衣。“粉的,好看,只比普通睡裙稍微透一点点。”洗完澡对着镜子看看,“也挺美的。”

4 规划中的“衣趣小镇”

“近两年,每年至少有四五千名外出打工的女性回来工作。”徐小舟说。

他是灌云县商务局负责电子商务的主任,他记得情趣内衣生意刚在镇上兴起时,灌云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确实不太好意思明面上扶持。”

渐渐地,大家发现这门生意不但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进来。村民把料子带回家缝,不种地的时候就做工赚钱。镇上的工人也没有上下班时间要求,方便接送小孩,“做一件算一件工钱。”

县政府于是顺应趋势,鼓励当地人学习电子商务。“每年有2000个免费名额,我们从上海、杭州聘讲师培训怎么开店,怎么推广。”徐小舟说,时代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不一定要带着有色眼镜看,把它当成一种产业就好了。

据他介绍,目前灌云县情趣内衣网络销售市场在全国占比达到60%,厂家和销售网店超过500家,其中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超过15家。

但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衣服档次偏低,同质化严重、厂房简陋、商家太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等。用工招工的难题也让厂家老板们头疼,“今天高兴就来,明天有事又不来了,管理很麻烦。”徐小舟透露,随着产业发展,老城区的伊山镇已容不下更多的工厂。在县政府2017年至2020年的规划中,相邻的东王集镇将打造一个产业园,把商家聚集起来,目的是引进高端人才和品牌,建设规范化的厂房,提升产品档次。

徐小舟说,产业园取名“衣趣小镇”。“不限于情趣服装,还有家居服。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吧。”

5 从漂泊到归乡

晚上8点,冬妮9岁的女儿到车间等她下班。

她盯着一个嘎啦嘎啦响的机器,1厘米宽的黑布带子从里面送出来。10分钟后,这些带子将被剪成小段,缝在内衣上的肩膀上。冬妮弄完,把它们装进篮子,准备回家。

婚后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她离开故乡出去打工。之后的六年,她一直在南京的电子工厂上班。凌晨两点的夜班是她最难受的时刻,流水线旁,她整夜整夜地想女儿。尽管只有330公里路,但周末她一般也不回家,“不敢回,舍不得加班费”。

“在外打工就一句话,没有尊严。”冬妮去年返回小镇,她一点都不留恋曾经去过的高级酒店、飘香的面包房和自动化的大工厂,“那是人家城里人的。”

现在,缝纫厂的工作按件计费,上下班时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孩子,这是几乎所有女工打这份工的原因。

起初,家里的老人不愿她做这个,“伤风败俗的破玩意儿,苦不苦钱?”一听说苦钱,“哦,那做吧。”“苦钱”,在当地方言里是“挣钱”的意思。

“什么是生活啊?生活就是,羽绒服给孩子买600的,老公买300的,我买200的。”冬妮想了想又说,“不行,还得买一件500的,串亲戚的时候穿。”

缝纫机停下来,屋里终于安静。苏芮刚柔交错的歌声从手机里飘出,混在喇叭的丝丝杂音里,让人仿佛置身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工厂。

有人跟着哼起来,“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程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文中冬妮、刘云为化名)

据《新京报》